

从汉宋兼采思想兴起看 清代学术的现代转向

——以翁方纲、章学诚、许宗彦三家学说为考察中心

孙运君

(西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重庆市 400715)

摘要:汉宋兼采思想学派是清中后期崛起的重要学术派别,前后流衍数百年,其兴起原因十分复杂,而乾嘉时期的翁方纲、章学诚和许宗彦的言论无疑起了非常重要的启迪作用。翁方纲认为汉学与宋学合则双美;章学诚则认为二者离则两伤;许宗彦认为汉学为下学,必须上达宋学才算圣贤之道。三人言论虽略有异,却都是为了补汉学之偏,救宋学之弊,透露出清代学术从前现代向现代转向的消息,今日探讨,仍有现实意义。

关键词:汉学;宋学;汉宋兼采;兴起原因;翁方纲;章学诚;许宗彦

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9841(2016)05-0167-06

近年来,学术界开始关注清代中后期汉学和宋学的调和(兼采)问题,成果颇多。但以笔者所见,这些论著对汉宋兼采思想兴起远因尚缺乏细致论述,相关意义研究亦付阙如。简而言之,汉宋兼采思想所以兴起有远因和近因之别,本文不涉远因,仅探讨近因,即以翁方纲、章学诚和许宗彦三个汉宋兼采思想先驱为中心。

早在清初,“王、顾、黄三大儒,皆尝潜心朱学,而加以扩充,开国初汉宋兼采之派”^[1]。及至乾嘉,汉学蓬勃发展,汉宋矛盾渐凌朱陆矛盾而上,汉宋学者之齟齬不合渐成水火,因而激成汉宋之争。由此,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思考汉学和宋学关系问题,试图解决二者之间的矛盾,翁方纲和章学诚便是其中健者。

一、“合之则双美”——翁方纲

翁方纲(1733—1818)重金石学和文学,不以解经显名,但是他评判汉宋学关系却独具慧眼,发前人所未发。

翁方纲生时,《汉学商兑》未刊,汉宋之争尚未成水火。但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当时钱载和戴震的一段关于汉学利弊的学术争论引起翁氏注意,并促使他撰写《考订论》九篇文章以为剖判(笔者注:他所谓之“考据学”即指汉学,所谓之“义理”即指宋学)。

第一,考据学应以探求义理为目的,“不衷于义理”是恒订考据学产生的主因。翁方纲说:“考订之学以衷于义理为主,其嗜博、嗜琐者非也,其嗜异者非也。不矜己、不嗜异、不嗜博、嗜琐而专以力

收稿日期:2015-12-10

作者简介:孙运君,历史学博士,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清代重庆地区书院教育研究”(2010YBLS32),项目负责人:孙运君;西南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宋初与晚清兼容思想之比较研究”(SWU1609158),项目负责人:孙运君。

于考订,斯可以言考订矣”^{[2]《考订论上之一》,p412}。翁方纲认为考据学所以兴起,就是因为学界空谈义理,淆乱“大道”,所谓“考订者,对空谈义理之学而言之也”^{[2]《考订论上之一》,p412}。因此过度考据必然产生僇订之学,其结果就是离经叛道:“凡所为考订者欲以资义理之求是也,而其究也,惟博辨之是炫而于义理之本然反置不问,是即叛道之渐所由启也”^{[2]《考订论上之一》,p412}。

就先秦儒学的学术功能而言,翁方纲的“叛道”论断虽是清初“学术误国论”的延续,但的确戳中了考据学末流的痛脚。虽然翁方纲对某些考订著作的批评有待商榷,^①但他对汉学的认识却很清醒,他认为考据学是学术研究“极正之通途”,“考订之学岂惟胜之,正赖有考订之学,然后义理尤长”^{[2]《考订论上之一》,p412}。可见在他眼中,汉学与宋学相辅相成,互为补充。

在考察考据学末流来源时,他说:“宋以后言义理则益加密矣,顾有恃义理之益明而转薄视汉唐注疏者,忽视《尔雅》、《说文》者,甚且有以意测义而断定训诂形声者;有所凭藉而直言某与某古通用者,此皆空谈义理、不知考订者误之,乃激而成嗜博、嗜异之侈为调说者,是二者其弊均也。言正误则开妄改之弊;言错简则开妄作之弊。若究其所始,则错简之疑始于郑康成之注《玉藻》,其断断言脱烂者,原自有所以处之,非私见也,而极其弊至于宋儒之改《康诰》首段以为《洛诰》之文则误甚矣!至于正误以某字当为某字,则郑氏之失为多,后人又岂得尤而效之?语其大者则衷之于义理,语其小者则衷之于文势,语其实际则衷之于所据之原处,三者备而考据之法尽是矣,然而文势亦必根据于道也,所据群籍亦必师诸近圣也。”^{[2]《考订论上之一》,p41-413}翁氏不仅指出汉学和宋学“二者其弊均”,而且很中肯地指出汉学所以流弊正是由于宋儒空谈之习所激成,可谓将汉学和宋学各打五十大板,持论之平,在乾隆时代实不多见。

第二,翁方纲界定了考据学的相关标准。乾嘉以来,考据学成为显学,学者发现世间万物,随手拈来,皆可以考订一番。如此,便出现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何者宜考,何者不宜考?即:考订的标准是什么?如果漫无边际地考订,势必产生弊病。翁氏立论即由此而来。

翁氏所立第一个标准即“是否有用于世”。他说:“且夫考订之学大则裨益于人心风俗,小则关涉于典故名物,然一言以约之,曰取资于用而已。”^{[2]《考订论上之三》,p414}并引《尚书》“不作无益”说做论证:“有裨于用者则当考之,其无益者则不必考,知此则考订之大端在是矣。”一切以有用、无用作为考订标准,堪称简单易行。为免学者误解,他又举反例进行解说:“如其不适于用也,虽以古经师、大儒所言,如郑氏之言六天,卢氏注大戴之言,明堂、路寝,甚至显著于经,如祭祀之皇尸、公尸,丧服之父在为母期年,此等不可行之事考之何用?不考之未为寡陋也。”翁氏娴于金石学,所以视野开阔,他认为如果有用于当世的话,即便是“后世书家、画家之迹,至如黄庭、乐毅、洛神诸本之原委先后能详考之,岂不有裨益乎?”所以,“考订不论其巨细远近,但争其有用与无用,有益与无益而已”^{[2]《考订论上之三》,p414}。

“明堂、路寝”是否有考订必要,今人仍可商榷。至于他所说的“适于用”是否合理恐怕也是见仁见智之谈。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其言论有利于针砭时弊,匡正学风。这说明乾嘉以来的主流学术已入歧途,翁方纲所论则旁证了这一学术转向的事实。

翁氏所言第二个标准为“是否有疑难”。他说:“凡考订之学盖出于不得已,事有歧出而后考订之,说有互难而后考订之,义有隐僻而后考订之,途有塞而后通之,人有病而后药之也。乃若义之隐僻者,或实无可阐之原,或猝无可检之来处,则虚以俟之可矣。事之两歧,说之互勘,而皆不得其根据,则待其后订而已矣,此亦庄生所谓缘督为经也。”^{[2]《考订论上之一》,p416}翁方纲在本着“有用考订”的原则下,总是不忘忠告考订家不可贪图快捷,要最大程度地保证自己考订的学术目的,不能因为矜气

① 翁方纲批评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毛举细碎、逞其口辨,甚至以‘危微精一’十六字为非经所有。凡此等谬说,皆起于偶有所见,而究其自信、自炫,遂反唇而不顾其安者皆嗜博、嗜异而不惟义理之是求也。”[清]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七,《考订论上之一》,《续修四库全书》第1455册,第412页)云云即是站在传统道德立场上的偏颇之论,尚未认识到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的学术价值。

使性而忽视考订学的严谨性,也就是说不能牺牲考据学之底线而迁就自己的虚荣心,对过分考订家的批评堪称一针见血。

综括言之,翁方纲的核心观点就是合汉学与宋学为一,他说:“考订者,惩纷纭而理之也,未有益之以纷纭者也,是故考订之学可以平吾心,可以养吾气,可以渐问于学道之津矣,故曰考订之学以义理为主。”^{[2]《考订论上之一》,p414}不过翁方纲虽然提出合汉学、宋学为一,但是并不主张汉宋“通邮”,他说:“划汉学、宋学之界者,固非也,其必欲通汉学、宋学之邮者亦非也。”^{[2]《考订论上之一》,p414}这说明他的学术主张依然侧重宋学,他所谓的“合一”骨子里是合汉学于宋学,这是时代所限,亦不必深责。

同为汉学批评者,相对于阮元等人的含糊其词,翁方纲第一次大胆提出了不分汉宋的口号。衬托以其考据学理论,笔者认为翁方纲可谓清中后期汉宋兼采之学的第一推动者。他从理论上界定了考据学研究方法、范围和标准,这预示着一场新的学术变革的到来,就清代学术史而言,转向已趋必然,其意义不言而喻。

二、“离之则两伤”——章学诚

与翁方纲重“和”相比,章学诚(1738—1801)则重“破”,而且是“破”后再“立”,但此“立”已经跃出神化儒学的窠臼,有向现代前进的意蕴。他一方面严辞否定汉学与宋学末流,一方面大张“六经皆史”之旗帜,试图另辟机杼,重塑经学。

章学诚生当康乾,名重后世。就其对汉宋兼采思想的影响来说,在于他对时代学术风气的双重批判。他的理论推理在乾嘉诸老中独树一帜,事实上,可以说是章学诚开辟了乾嘉以来新的学术批评话语系统。这一系统拓宽了汉宋兼采学者的学术视野,兼采学者又在此基础上完善了这一话语系统。

首先,批评汉学。章学诚对汉学末流的批评是不遗余力的,主要分为三点。

第一,汉学家“学无所主”。他说:“有贱儒者,不知学问之为己而骛博以炫人焉,其为学也,泛无所主,以为一物不知,儒者所耻,故不可以有择也。其为考索也,不求其理之当而但欲征引之富,以为非是不足以折人之口也;其为纂述也,不顾其说之安而必欲赅而俱存,以谓刘歆有言,‘与其过而废也,毋宁过而存之’,此说良所允也。此其为述,蠢愚钝拙,而其为说,亦窒戾不通之至矣。然而当世犹有称之者,学术不明,而驳杂丑记为流俗之所惊也。”^{[3]《博杂》,p339}章学诚的这个批评在后世获得很多知音,即便是对乾嘉诸老持褒扬态度的胡适也没有否认这一点,此不赘述。

第二,汉学家为考据而考据,陷入求知怪圈。事实上,考据学的汗漫无边确是掉进学术泥淖而不能自拔,章学诚引《庄子》“以有涯之生逐无涯之知,怠矣”讥刺汉学诸儒之懵懂颛顼时说:“今不知为己,而务博以炫人,天下闻见不可尽,而人之好尚不可同。以有尽之生,而逐无穷之闻见,以一人之身,而逐无端之好尚,尧舜有所不能也。……如其能之,是妖孽而已矣。”^{[3]《假年》,p236}章氏将部分考据学家詈为“贱儒”和“妖孽”,用词过分刻薄,但以今人眼光观之,却并非不可理解。章学诚其实是站在先秦儒家的立场上立论的,他认为“孔子之大,如天之不可及,然而其学可以一言尽也。”而当时考据家却矜奇炫博,其行无异于“夸父逐日,愚公移山”^{[3]《假年》,p339},这就难怪章氏批评时口不择言了。且这一评论堪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可谓入木三分,痛快淋漓。平心而论,彼时汉学末流不仅拒斥关怀社会的儒家本色,也放弃了创新学术的士大夫天职,章学诚对这一风气的批判堪称有的放矢。

第三,清代汉学家的考据学与古代考据家目的不同。他说:“古人之考索,将以有所为也,旁通曲证,比事引义,所以求折中也。今则无所为而竟言考索。”^{[3]《博杂》,p340}但是清代考据家却“不求其是而务穷其类”。章学诚认为考据求是,可以举一反三。而穷其类,则不免挂一漏万,并因之“文室理芜,而所言皆作互乡之噂沓”。今人或以为乾嘉诸儒限于文字狱的图囿而无力自拔,从而予其以同情。章学诚则站在儒家道统的立场上给予无情揭露:“夫学问文章,君子之出于不得已也。人皆心知其意,君子方欲忘言,惟不能不迹于学问文章,不幸而学问文章可以致名,又不幸而其名诚有所

利，慕利者争名，而托于学问文章，甚至伎很贪求，无所不至，君子病焉。”^{[3]《答吴晋石书》，p646}由此可见乾嘉诸儒不仅学术失范，甚且道德失范，这也就难怪章学诚痛下针砭，不留情面了。

其次，批评宋学。章学诚批评宋学主要分两点。

第一，宋学末流空疏。他说宋学：“空谈性理，孤陋寡闻，一无所知，乃是宋学末流之大弊。”^{[3]《又与朱少白书》，p783}又说：“宋儒之学……外轻经济事功，内轻学问文章，则守漏自是，枵腹空谈性天，无怪通儒耻言宋学矣。”^{[3]《家书五》，p822}章学诚批评宋学的弊端其实并未逃出前人窠臼，但是他没有如时人那样将宋学一棒打死，而是认为“君子学以持世，不宜以风气为轻重；宋学流弊，诚如前人所讥，今日之患，又坐宋学太不讲也”^[3]《家书五》，p822]。

第二，汉学和宋学应该互相补充。他明确提出汉学和宋学唇齿相依，在原初是统一无间的。他说：“古今以来，合之为文质损益，分之为学业、事功、文章、性命。当其始也，但有见于当然而为乎其所不为，浑然无定名也。其分条别类，而名文、名质，名为学业、事功、文章、性命而不可合并者，皆因偏救弊，有所举而昭示于人，不得已而强为之名，定趋向尔。后人不查其故而徇于其名，以为是可自命其流品，而纷纷有入主出奴之势焉。汉学宋学之交讥，训诂辞章之互诋，德行学问之纷争，是皆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也。”^{[3]《天喻》，p332}而遗憾的是，宋学家和汉学家皆是为了争“流品”而自立门户，又因门户和利益之争而喋喋不休，互相攻讦，并因此而离“道”愈远。章学诚对此非常痛心，他用比喻的方式揭示出汉学和宋学都是“求道之资”，二者不可偏废。他说：“故记诵者，学问之舟车也。人有所适也，必资乎舟车，至其地，则舍舟车矣。一步不行者，则亦不用舟车矣。不用舟车之人，乃托舍舟车为同调焉，故君子恶夫似之而非者也。”^{[3]《辨似》，p158}章学诚批判汉学家永远在资舟车的旅途中，茫然不知其目的地，所谓“博涉既深，将超记诵”^{[3]《辨似》，p158}。而宋学家则永远站在此岸遥视彼岸，凭借想象勾画彼岸的景象，从来不想通过舟车去彼岸看个究竟。二者一动一静，看似相宜，其实迥然有别，都缺乏求道的资质。

再次，章学诚提出了通学观。

章学诚对于训诂学的滥用很气愤，他说：“训诂流而为经解，一变而入于子部儒家，再变而入于俗儒语录，三变而入于庸师讲章。不知者习而安焉，知者鄙而斥焉。而不知出于经解之‘通’，而失其本旨也。载笔汇而有通史，一变而流为史钞，再变而流为策士之类括，三变而流为兔园之摘比。不知者习而安焉，知者鄙而斥焉。而不知出于史部之‘通’，而亡其大原者也。”^{[3]《释通》，p238}这里虽就史学立论，但同样指出了汉学之病痛所在，汉学家之所以为考据而考据，不懂得“学业将以经世也”^{[3]《天喻》，p332}的道理，正因为他们忽视经解中“通”的学术宗旨，不知其研究活动的彼岸，不知其考据学最终的指向，所以才会招来“短钉”“琐碎”的指责。

章学诚针对当时学术流弊，发表了整顿学风的意见。他说：“程子曰：‘凡事思所以然，天下第一学问。’人亦盍求所以然者思之乎？天下不能无风气，风气不能无循环，一阴一阳之道，见于气数者然也。所贵君子之学术，为能持世而救偏，一阴一阳之道，宜于调剂者然也。风气之开也，必有所以取；学问、文辞与义理，所以不无偏重畸轻之故也。……而世之言学者，不知持风气，而惟知徇风气，且谓非是不足邀誉焉，则亦弗思而已矣。”^{[3]《原学下》，p112-113}

章学诚作为第一代汉学批判者，与桐城派相反，他认为考索、文辞和义理是离之则两伤，合之则双美的关系，丢失任何一样都是学术风气的重大损失，对于“求道”都会产生可怕的后果。相对于翁方纲的“一归于义理”的偏宋学理论，章学诚则明确指出资本除了要问其然，更要问其“所以然”，这已接近现代学术之境。且“天下第一学问”的提出正印证了他“六经皆史”的神学祛魅主张，章学诚亦因言论忤时而成为边缘学者。但他的主张无疑符合时代发展潮流，之后的岭南汉宋兼采学派深受其影响，他们正是在关注学风的前提下关注西方，主张教育改革，要求更新学术面貌。

三、“下学而上达”——许宗彦

相对于章学诚的寂寞无闻，许宗彦（1768—1818）时名甚高，深得学界嘉誉。他是嘉庆己未

(1799年)进士,是科号称得人甚盛。当时学者朱珪曾说:“经学则有张惠言,小学则有王引之,词章则有吴鼐等,兼之者其许生宗彦乎?”^[4]₁₂₅₀₋₁₂₅₁其座师阮元亦十分推崇他。同年陈寿祺更是夸赞他为“于越士足以蹶梨州(黄宗羲)而跨堇浦(杭世骏),岂独一时之魁能冠伦者哉!”^[5]₃₉₃由此可见许宗彦在学问上造诣颇高。他的学说与本文相关者主要有三点。

第一,重大疑难问题应该搁置争议,拒斥繁琐考据。许宗彦在《寄答陈恭甫同年书》中认为治学的目的在于求得心安,而不是趋奉时尚,否则便不配称学者。并大胆预测即便孔子生当斯时,也不会皓首穷经于“三代之言”,至多“由明溯宋而止耳”^[6]《寄答陈恭甫同年书》,p400。因为三代久远,于当世无用。所以他说:“宗彦以为经宜之大者十数事,前人聚讼数千年未了,今日岂能复了之?就今自谓能了,亦万不能见信当时,取必后世。如仅仅校勘文字同异伪说,或依傍小学辨析训诂形声,又或掇拾零残经说,所得盖小,私心诚不欲为之。”^[6]《寄答陈恭甫同年书》,p399-400他这种搁置争议,留待将来的建议貌似荒诞,其实却是言有所据,因为在他心目中学者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第二,治学目的在于“明道救世”。许宗彦主张调和汉宋,“为学务求六经大义,深观自汉以来二千年治乱得失,究古今儒道隆替,文章真伪,不屑校讎文字,辨析偏旁训诂,不惑于百家支离蔓衍迂疏寡效之言”^[7]₁₄₇。他的治学宗旨既不同于汉学,亦不同于宋学,倒有几分清初顾、黄、王的实学味道,如其所言:“夫学之虚实,至易明也。积之内,见之外,行其所学而贤不肖皆见焉,言其所学而贤不肖皆可知焉,斯之谓实学也。”^[6]《原学》,p461他认为孔子之学很简单,就是“期于有用”,所谓“明道而行之”罢了。而时儒之学则是“愚疏寡效”,既无当于国家,亦无当于人心,简直是“茫然不知其所谓”。这些言论与汉宋兼采学者陈澧和黄式三父子的言论如出一辙,可见他们学术的内在联系。

许宗彦提倡“积之内,见之外”,虽然貌似程朱理学的内圣、外王之学,但是许宗彦一生极少谈及程朱,是以参考他后面所论之“圣人之学”,我们可知他所要提倡的其实是创自宋代永嘉、永康事功学派的经济、事功之学。史载他“尤精天文,得西洋推步秘法,自制浑金球,别具神解”^[4]《许周生先生平略》,p1251,由此可见一斑。

第三,治学应该由“下学”而“上达”,不能顾此失彼。那么,许宗彦在破掉汉学的虚伪无用之后,又如何积极纠正当时的学术风气呢?他说:“学也者,所以求知也。知者何?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又自言五十而知天命,始于知言知礼,终于知天命,知之事也。所谓下学而上达者,诗书执礼则下学也,知天命则上达也”^[6]《学说》,p445。这种论断其实是将知识与现实联系起来,既要知识学习有的放矢,又要将礼制落到实处,应该说这才是先秦儒学的本质。清儒在这方面显然误入歧途。他说:“后之儒者,研穷心性而忽略庸近,是知有上达而不知由于下学,必且虚无惆怅而无所归,考证训诂名物不务高远,是知有下学不知有上达,其究琐屑散乱,无所统纪,圣贤之学不若是矣。”^[6]《学说》,p445知上达而不知下学指宋学一派,知下学而不知上达则是指汉学一派。在这里许宗彦对汉学和宋学都做了批评,说明他对宋学和汉学都不甚满意,因而他认为如果将汉学和宋学结合起来则会变成真正的“圣贤之学”,即是由下学而通上达。这点许宗彦和章学诚观点相类,只是章学诚宗“破”,主张学术祛魅,而许宗彦宗“成”,主张明道救世,其说事功味道浓厚,显是时代激荡而成。

四、余 论

综上所述,翁方纲是要将汉学和宋学合二为一,从而恢复宋儒之学,其说传统味最重;章学诚则跳出神学窠臼,欲将汉宋学术一并于史学,从而恢复先秦儒学本来面目,名为复古,实为开新,已迹近现代之境;许宗彦则致力于有用,并究心于西洋科技,为学尚经世,为说主事功,思想上实已入现代之域。

概以言之,这种转向分三个方面:第一,学术祛魅。翁方纲出身汉学而排抵繁琐考据,堪称入室操戈,此是祛迷信考据学之魅;章学诚倡“六经皆史”,实则将清廷主导的“尊孔”“尊儒”观拉下神坛,

复归儒学之本来面目,还孔子以“教育家”而非“素王”之真实身份,可谓“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此是祛儒学神学化之魅。第二,倡学术自由。所谓学术自由,即是让学术本着自身逻辑朝着健康有效的方向发展。由于学风流被,乾嘉时期考据学蔚为大观,为考据而考据之风亦成流弊,否则也不会激成后来的“汉宋之争”。翁方纲能够观微知著,反对学界被考据学所绑架,其预见性实在令人惊叹。翁方纲的九篇《考订论》主旨可以一言以蔽之曰“还学术以自由”;后起章学诚的“通学观”,许宗彦的“下学而上达”不仅针砭末流考据学,而且剑指制艺之学。考据学以“恒订”考据绑架真知,制艺学以科举误导学术,二者都损害了学术自由性,三人起而反之,对于后来的汉宋兼采学派调和汉宋,沟通考据与义理大有滥觞之功。第三,相信科学。乾隆时代的翁方纲和章学诚对于西洋科技尚且了了,但是嘉道时期的许宗彦则在为学之余,大倡科学之道。其重视事功的价值取向更是将古老中国的形上学取向之传统拉回现实。后起汉宋兼采学者中林伯桐《供冀小言》中浓厚的经世情怀,陈澧对于《海国图志》的褒扬,朱一新对于兵法的独见,都是许宗彦经世致用、经济事功之学的继续与开展,其中蕴涵的浓厚的科学热忱和技术理念之味已扑面而来。由于前后没有明确的师承关系,因之更可见清代学术思想已经在孕育一场大的变革风暴。

从翁方纲到许宗彦,清代学术一转再转,从皈依宋学到皈依科学,再至皈依现实需要,昭示了清代学者从前现代一步步向现代迈进的艰难步伐。这种转向可能是被动的,甚至是被迫的,但是所幸这些言论启迪了后来的汉宋兼采学派。虽然翁方纲、章学诚的神权祛魅没有高标旗帜,翁、章、许三人也没有高呼“学术自由”这样的现代字眼儿,但是题中之义已经不言自明。嘉道以后,陈澧的岭南学派、黄以周的皖浙学派、曾国藩的湖湘学派正是在这些思想的影响下重整学风,调和汉宋。汉宋兼采后学既究心治学宗旨,排斥门户之见,又关心西洋学术,重视教育实践,从而在政治味浓重的今古文经学混战中保留了一块价值中立的学术净土,其意义堪称深远。

参考文献：

[1] 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2011：222.

[2] 翁方纲．复初斋文集：卷 7[M]．《续修四库全书》第 1455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3] 章学诚．文史通义新编新注[M]．仓修良，编注．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

[4]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 44[M]．长沙：岳麓书社，2008.

[5] 陈寿祺．驾部许君墓志．左海文集：卷 10[M]．《续修四库全书》第 1496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6] 许宗彦．鉴止水斋集[M]．续修四库全书：第 1492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

[7] 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M]．长沙：岳麓书社，1998.

责任编辑 张颖超
网 址：<http://xbbjb.swu.edu.cn>